

续 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中共甘孜州第五届委员会 (1989.5~ )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洛桑拼错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陈开华	汉族	1989. 5~	

## 第三章 宣传教育

### 第一节 群众宣传

1950年3月,康定地委成立时,即建立宣传部,配备宣传干部。以后各县(工)委成立,相继建立宣传部。50年代,地委指示要在农村牧区建立宣传网,加强基层宣传队伍建设。经过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一般乡一级建立7~9人组成的宣传委员会,村或社队建立宣传站,开展读报、文娱、办黑板报等活动。党、政在进行每一项重要工作时,都划出一定时间,首先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讲解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并且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机构瘫痪,宣传队伍冲散,宣传工具成了搞派性、武斗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做群众宣传工作这一优良传统,加强和充实宣传部门的干部,县以下的区乡配备专(兼)职宣传干事,基层党支部设有宣传委员,分工抓群众宣传工作。

宣传内容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1950~1955年,按照地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几次大的群众宣传活动。一是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除利用各种会议,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青年代表会、妇女代表会等进行宣传,更多的是组织干部下农村牧区,走村串户,送政策上门。刚解放时,有的土司头人,受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欺骗,认为共产党来了,“土司头人活不出来”,因而抱“坐观动静”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康定军管会领导和派到各县的军事代表、军事联络员,多次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谈心,反复讲解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谣言和欺骗宣传,加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他们中多数的疑惧心理逐渐消除,从而靠拢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合作共事。二是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仅1951年,全区各族人民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的人在15万人以上,占全区总人口30%。参加订立爱国公约的各族人民近8万人,超额完成了捐献高射炮一门的计划。同时推动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

工作。经过这次宣传教育，各族各界人民，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三是大力宣传西康省西藏自治区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和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团结爱国公约》。着重宣传“过去所有县、区、村及个人的不团结事件，均应在团结爱国基础上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诚恳协商，本既往不究和互让互谅精神调处解决。”“严禁再有挑拨、械斗、仇杀、抢劫、种烟、贩毒等非法行为，违者一律依法严惩。”通过对两个文件的宣传和协商调解，仅1951年和1952年两年时间，就调处大小纠纷3000多件。四是宣传西康省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十项工作任务，和第三次会议通过的《1953年农牧业生产计划要点》。着重宣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加强对畜牧业的领导，普遍开展爱国丰产增畜运动，改善各族人民生活”的总方针，以及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各项具体政策。通过宣传教育和各项措施的落实，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仅1953年无地缺地农民开荒生产，便扩大耕地面积29000余亩，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

1956~1959年，着重宣传民主改革和平叛斗争的方针政策，宣传《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关于废除高利贷调整债务关系实施办法》等几个文件。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接着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和农牧业合作化方针政策的宣传。1958年以后，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宣传工作也出现了失误。如宣传“一大二公”、“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这在后来虽作了纠正，却留下不好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群众宣传活动陷于混乱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宣传工作走上了正轨。1979~1990年，在全州范围内宣传三中全会公报精神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及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指示。在城乡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宣传，普法宣传，包括全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甘孜州自治条例的宣传。80年代以来，宣传工具现代化有较快发展，不少地方包括一些区乡，可以看到电视，直接听到国际国内重大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

几十年来，州的群众宣传工作有几点好的作法：（1）领导干部带头做群众宣传工作。1950年11月，西康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前夕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从中央访问团团团长刘格平、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到康定地委、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在各种场合，针对各阶层人们的思想，通俗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影响

很好。以后，有不少领导干部，无论走到哪里，能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给干部和群众作形势、政策和任务的报告，起了很好的作用。(2) 干部下乡、下牛场和农牧民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50年代初，在干部极少的情况下，地委和各县（工）委，每年都抽人下去，组成工作队、组，由领导干部带队，走村串户，帮助群众做好事，了解群众的思想，宣传讲解党的政策。民改期间，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干群关系融洽，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在以后，凡是坚持了这一条，群众宣传工作都能做得有声有色。(3) 汉族干部与民族干部互相学习，突破语言障碍。有的汉族干部，学会藏、彝语言，直接用藏、彝话和群众交谈。有的民族干部努力学习汉语文，可以直接宣传讲解党的政策，不需要汉族干部讲一遍再去翻译一遍。

## 第二节 理论学习

50年代，地委对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比较紧。规定在职干部，有计划地学习中央宣传部统一制发的中、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目录和书籍。1952年11月，西康省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在职干部学习的几项规定》后，州、县机关建立学习委员会，下设学习小组（根据工作情况，文化水平和语言，按自愿原则分别编组）。地委宣传部分阶段布置学习内容。每一阶段学完后，收集汇报，由领导干部作小结报告。除组织学习政治理论，还要学习时事政策、业务知识和藏语文。50年代中、后期，州委宣传部建立理论教育科，配备理论教员7人；各县（工）委宣传部陆续配备理论教员1~2人，担任理论学习辅导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展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由于忙于搞政治运动，这种系统的理论学习一度被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教育工作瘫痪，理论是非混淆。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逐步恢复理论学习，有计划地安排学习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1983年6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州委建立干部理论学习讲师团，承担辅导、讲课任务。1984年至1986年上半年，安排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开展这一学习前，州委宣传部与讲师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举办全州学习哲学备课会，培训一批学习辅导员，然后在州、县机关铺开。学习方法有两种：一是办读书班，集中脱产学习；二是每周安排半天学习。州级机关直属党委采取办读书班的办法，一共办了七期，分批组织应参加学哲学的干部，学完哲学这门课程。有的县级机关亦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办两期或三期，就学完哲学这门课程；有的县级机关则安排一周学习半天。坚持得好的，一年半学完哲学这门课程；坚持不好的，时学时停的，一直拉到1986年上半